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Foreign Trade

主编：周新生

孟 铁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主 编 周新生 孟 铁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 周新生, 孟铁著.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044-5952-7

I. 中... II. ①周... ②孟... III. 对外贸易—概论—中国 IV. 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1384 号

责任编辑: 刘洪涛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100053)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山西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大32开 15.875 印张 404 千字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前 言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贸易专业所设立的一门主要的专业基础课。作为一部门经济学，在总结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专门研究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理论、有关方针政策和实际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的国际贸易专业基础课程。该门课程的特点有二：一是宏观性，主要是从宏观上研究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关理论、方针政策和实际问题；二是发展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关对外贸易的理论、方针政策在发展，实际工作有更大的发展变化。因此，这是一门动态的、发展的学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广泛，已从传统的商品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等领域，经济交往的内容包括了货物、服务、技术、资金、管理、信息等方面。新时期就有新要求。本书是一部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较全面介绍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理论与政策的教材，在以往同类教材的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新内容、新成果。

本书系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国际贸易系列教材之一，由周新生和孟铁主编，并负责全书框架的设计，最后由周新生修改定稿。具体编写者如下：周新生（第一、三章），孟铁（第二、四章），聂引娥（第五、十三章），李丽（第六章），武斐婕（第七章），郭建宇、杜晓英（第八章），杨涸（第九章），朱丽萍（第十章），任荣（第十一章），张文静（第十二章），王丽荣（第十四章）。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参阅了大量的相关书籍、报刊杂志，借鉴了一些科研成果，由于篇幅有限，不能逐一列出，在此我们向这些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时间仓促，我们的学识和写作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疏漏，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二〇〇七年二月

第一节	技术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49
第二节	引进技术概况·····	153
第三节	引进技术的战略和基本方针·····	165
第四节	技术出口·····	171
第七章	利用外资 ·····	177
第一节	利用外资的意义·····	177
第二节	我国引进外资的概况·····	182
第三节	引进外资的方针政策·····	202
第四节	“走出去”战略·····	214
第五节	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	237
第八章	加工贸易 ·····	249
第一节	概述·····	249
第二节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概况·····	255
第三节	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263
第九章	对外贸易价格 ·····	274
第一节	国际与国内市场价格的区别与联系·····	274
第二节	国际商品市场价格体系与价格类型·····	281
第三节	我国对外贸易的作价原则·····	288
第四节	进出口贸易定价的基本方法·····	294
第五节	影响对外贸易价格的因素·····	299
第十章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 ·····	306
第一节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	306
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形成·····	307
第三节	影响外贸经济效益的因素·····	311
第四节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评价·····	320
第五节	提高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	328
第六节	OEM 与对外贸易效益·····	332
第十一章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 ·····	336

第一节	中国实行对外贸易管理的必要性·····	336
第二节	中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制手段·····	338
第三节	中国对外贸易管理的经济调控手段·····	354
第四节	中国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行政手段·····	363
第十二章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393
第一节	对外贸易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394
第二节	对外贸易体制的初步改革·····	395
第三节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化·····	399
第四节	市场经济体制与外贸体制改革·····	409
第五节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419
第十三章	WTO 规则与中国外经贸的发展·····	428
第一节	WTO 主要规则概述·····	428
第二节	当前中国面临的外经贸热点问题·····	442
第三节	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450
第十四章	中国对外贸易国别（地区）关系·····	461
第一节	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基本政策和原则·····	461
第二节	中国同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	466
第三节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	478
第四节	中国同独联体各国、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	484
第五节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贸易关系·····	490

第一章 中国对外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教学目的：要求学生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后对外贸易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从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对外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掌握对外贸易的性质与社会经济制度。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对外贸易

中国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久远的历史中而难以确认，但有关史证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五世纪，因丝绸之路的开辟而较早兴盛于汉武帝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中国丝已见于波斯市场。德国发掘的一座公元前500年的古墓，发现了中国丝绸服装的残片。而古希腊的一些雕刻和陶瓷彩绘人像所穿的衣服，被肯定为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丝绸。可见，中国丝绸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已被远销到西方，成为西方人最早知道的中国产品，因而他们把中国称为“赛里斯国”，意即丝之国。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以贩运丝绸为主的国际交通贸易道路——丝绸之路就已经出现了。从战国直至明末，中国一直是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占居着有利的主动地位。

一、汉代的对外贸易

汉代通过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与东西方各国开展了广泛的贸易往来。不过，这一时期经由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亦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的

国家。

西汉时期，张骞（？-前114年）两次出使西域，出访中亚、南亚、西亚各国，各有关国家也派出使臣回访长安，由此建立起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经常性的外交往来，大大促进了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张骞第一次（公元前139年）出使西域时，在大夏曾看到来自中国蜀地的邛竹杖、蜀布，由此获悉，自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经缅甸至印度进而到中亚有路可通，这一道路在沟通中国与缅甸及印度的民间贸易上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不仅与西域大国乌孙结盟，而且还联络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于阗（今新疆和田）、扞弥（今新疆于田）及周边诸国。自此，汉朝与西域及西方诸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

在中西方外交关系建立的同时，丝路贸易日趋繁荣兴旺，通过丝绸之路和蜀身毒道，中原的丝绸、漆器、铁器等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天山南北及中亚、南亚及西亚各地，输入了葡萄、苜蓿、黄瓜、胡萝卜、汗血马和佛教、魔术，境外的奇禽异兽、象牙珠宝等奢侈品也大量涌入中国内地。

西汉政府为保证丝绸之路这一交通路线的安全和畅通，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推行汉中央政府的政令；建立完备的军事防务系统，修整和延长长城；公开招募使臣，开展官方贸易活动；优待来华外国商使。这些措施均推动了中外贸易的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外贸易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传统的出口商品制造业——丝织业仍有显著进步。一方面，丝织业的生产区域扩大。由于北方战乱，自东汉末年開始北方人成批渡江南迁，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逐渐传播到南方。在政府提倡及市场的刺激下，长江中下游地区蚕茧缫丝业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丝织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新疆等地的出土的丝织品来看，北朝的

织锦工艺较汉代更为精湛，其丝织品提花准确、整齐，锦面精致美丽，图案轮廓分明。这一切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汉代丝绸之路的最大威胁——匈奴已经衰弱西迁，中原与西域、中国与中亚的交通贸易路线基本通畅。随着各国、各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开展丝路贸易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中国境内控制丝绸之路的各北方政权均面临着程度不同的财政压力，因而注意维护丝路的交通、发展丝路贸易成为其必然选择，故这一时期丝路贸易不但未曾中断，反而有了进一步发展。

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丝绸之路所以能空前畅通与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关：恢复设置西域的军事、行政管理机构，加强与西域各地的政治、经济联系；为来华外商提供便利，特设立接待外国商人、使节的“四馆”——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崦嵫馆，其中崦嵫馆即专门用来接待来自西方的使节和商人，在御道之西设立“四里”，供外商侨居，其中“慕义里”是专门提供给来自西方的侨居者；北魏政府还在洛阳设有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称为“四通市”；为保护中外商人，还实行了“过所”制度，敦煌郡给东来西往的商人发放“过所”，即通行证。这些措施，大大方便了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

三、隋唐时期的对外贸易

隋朝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它实施的诸多政策措施，收效于唐，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有关丝路贸易的措施主要有：（1）恩威并施，畅通丝路；（2）设立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屯田；（3）设立管理丝路贸易的主管官员。（4）积极招徕外商。

公元610年，隋炀帝应胡商的要求，批准在洛阳召开一次中外商品交易会。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令洛阳城装饰一新，准备了充足的货物，迎接来自西域各地的商贾。从正月十五到月底，在洛阳丰都市场上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中外商品交易活动。此后，胡商纷纷涌入洛阳、长安等内地贸易，中外贸易渐趋繁荣。

唐朝，全国出现了统一安定的局面，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唐代的丝织业、陶瓷业、金属铸造业都很发达，这些手工业品，尤其是丝织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

随着航海、造船水平的提高，东南沿海地区日益显示出其在对外交往上的优势，而昔日中外交流的孔道—西北丝绸之路不再具有地域上的比较优势了。同时随着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境外国家对中国的瓷器出现了较大的需求，而瓷器是一种易碎品，且重量较大，海上运输比陆路运输更为适宜，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加强中外政治经济联系，维护唐王朝的国际威望，满足上层社会对海外奇珍异物的奢侈性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海外贸易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唐代对外开放的总政策下，海外贸易活动受到积极鼓励，其政策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1. 优待外商。对官方朝贡贸易使臣厚礼接待，政府以优惠价与外商交易；

2. 尊重外商习俗和宗教信仰；

3. 保护外商的合法利益；

4. 确立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

市舶使负责对进口货物进行登记、分类、征税；设置栈房，保管外商货物；管理外商的在华贸易。海外贸易勃然兴起，中国海外贸易政策及管理制度逐步系统化。

由于唐朝实行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许多国家的商人纷纷来中国经商，去中不少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内陆城市长安、洛阳、兰州以及沿海港口广州、泉州、宁波等地。在中国经商和居住的外国商人，以伊朗和阿拉伯商人为最多。

四、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

宋元时代，海外贸易受到高度重视，中国海外贸易进入了发

展的黄金时期，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逐渐趋于完善。

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两宋时代发生质变，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空前提高，政府财政收入 70%来自工商税收，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近代工商社会。在此基础上，以贸易路线转向海洋、贸易商品结构转向日用消费品为标志，中国外贸迎来了第二次飞跃。由于国内经济空前发达而丝绸之路又被西夏隔断，始于汉晋的海路贸易在两宋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很快就显示出了相对于陆路贸易的优势。在以陆路贸易为主的年代，受陆路运输能力之限，中国外贸商品结构不能不以量少价高的奢侈品为主；而在两宋时期的海路贸易中，日用消费品贸易日益崭露头角。宋朝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从东亚的高丽、日本到远处西洋的印度、阿拉伯、东非，中国商人和水手在各地海岸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对外贸易的空前发达使之第一次具备了财政上的重要性，局促于东南半壁的南宋朝廷对外贸收入的需求更为强烈，“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南宋绍兴末年（1162 年），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 200 万贯，接南宋进口商品关税率 7%~10% 推算，仅上述三个市舶司年进口纳税货物即达 2000 万~3000 万贯，加上其他口岸的贸易，当时南宋人均进出口贸易额当在 1 贯以上。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发展海外贸易的目的主要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为此两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海外贸易的措施：（1）主动遣使海外招徕外商；（2）通过奖励、敦促、重用外商等手段吸引外商来华；（3）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4）优待来华外商，为其在华活动提供便利条件；（5）设立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或市舶务、市舶场），并保证市舶司资金充裕，以维护中外贸易的繁荣发展。

此外，公元 1076 年，宋王朝开始着手制订海外贸易管理法规，历时 4 年，到元丰三年（1080 年）颁行，称为“广州市舶条（法）”，又称“元丰市舶法”。元丰市舶法的颁布，标志着中

国对外贸易立法的开始。

当军事先天不足的赵宋王朝最终沦亡之后，接收了宋朝航海技术的蒙元政权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力扩张而不是和平的贸易交往。直到明成祖朱棣决心在海外恢复中国的文明形象之后，中国外贸才重新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使臣托梅·皮雷斯抵达广州，欧洲商人随后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迅速膨胀，里斯本——好望角——果阿——马六甲——澳门、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广州——马尼拉/澳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长崎等贸易航道相继建立，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了它历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不仅对国内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贸易顺差、白银内流引起了中国财政与货币制度的革命。

通过军事征服建立的元王朝，其综合国力较宋代大为增强。蒙古大军从漠北到中原、从中国到中亚、西亚直至欧洲的远征使其眼界大开，刺激了统治阶层对各种珍奇异物的需求欲望。随着大蒙古帝国的解体，元朝统治者认识到，依靠武力无法维系帝国的稳定，只有接受先进文化，发展经济才能巩固统治基础。可见这一时期发展对外贸易的日的已颇为明确：即互通有无，实现使用价值的转换，从而满足上层社会对海外奢侈品的需求。为此，元朝对发展海外贸易高度重视，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性措施：

（1）积极鼓励外商来华；（2）积极组织海外贸易（官商及官本船贸易）；（3）祭祀海神“天妃”；（4）鼓励民间贸易；（5）完善市舶制度；（6）修订市舶法规。

五、明朝至清前期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三百年间，中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日趋活跃，某

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开展海外贸易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然而明王朝为巩固其封建政权，极力切断中外民间贸易关系，于明前期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海禁政策的实施虽巩固了明政权，但它同时也破坏了中外正常的经济联系。为满足统治阶层对海外奇珍异物、香料等的需求、为达到“万国来朝”的封建盛况，明王朝在禁断私营海外贸易的同时，积极推行“朝贡贸易”政策。

所谓朝贡贸易即入贡国家表明臣属于中国，接受中国的册封，将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奇珍异物以贡品的名义进献给中国皇帝，中国再以丝绸、金银、瓷器等以“赏赐”的名义回赠。或中国派使臣出访主动“颁赐”，外国回赠品仍被视为贡品。这种表面上的外交往来，实质上是官方的易货贸易，并长期成为中国官方贸易的主要方式。为了配合朝贡贸易，还实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勘合制度。这一制度严重损害了“入贡”国的经济利益，中外官方贸易急剧下降，到1397年，前来“朝贡”的国家只有朝鲜、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及琉球数国。

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到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明政府派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每次大小船只200余艘，人员2万多，各种宝物数以万计，与亚非各国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将明代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官方贸易——“朝贡贸易”推向顶峰。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人发现了通往印度及美洲的航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此发生了巨大变革。广大的亚非拉美地区纷纷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受到冲击，中国与亚非国家的“朝贡贸易”日趋衰落，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渐次发生，民间贸易风起云涌。明政府被迫部分地开放了海外贸易，私人海外贸易终于合法化，但其依然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限制，因而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与欧洲殖民者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欧洲人则在其政府的支持下在西

太平洋及北印度洋的贸易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在东方海上贸易的优势日益丧失。

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居多，自南宋以来，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质变，凭借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和低廉价格，中国商品在与欧、美和日本各地商品的竞争中一路凯歌，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各类商品均大量输出，尤其是纺织品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国际竞争力。从英吉利海峡到东非沿岸，从美国切萨皮克海湾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出土文物和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纺织品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辉煌。中国出口的空前增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际收支，来自美洲、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货币金属匮乏的中国消除了自从北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钱荒”，白银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本位货币。

兴于唐，发展于宋元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被明王朝所继承。不过，与明代对外贸易政策相适应，市舶制度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职能上都与前代有了很大不同。到明代后期，随着中外贸易关系的变化，市舶司在对外贸易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弱化，这一制度最终走向解体。

自公元 1644 年，清军入关，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前期，即 1840 年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其对亚非拉地区殖民掠夺日益加剧。而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尽头，国民经济限于停滞状态。清王朝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鄙视一切外来文明，闭目塞听。尽管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来华，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但中国清王朝始终实行对外贸易的严格限制政策，并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冲突中不断强化这一政策，

其结果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中国社会故步自封，生产力的进步受到严重制约。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清代中国对外贸易限制政策又经历了开海到禁海、到开海设关、由多口通商到一口通商的演变历程。

清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

时 期	主要贸易特征
顺治初年	允许商人出海贸易
顺治十三年~康熙二十三年	全面海禁与局部开放
康熙十三年~乾隆二十二年	多口通商
乾隆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前	广州一口通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统一台湾，康熙帝随即颁布开海令。公元1685年，清王朝在江南的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后移往上海）、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广东的广州设立江、浙、闽、粤四大海关。四大海关作为沿海各省总关统一管理本省各口岸的对外贸易。标志着中国海关制度的确立，唐代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终结，中国海外贸易管理开始了新的篇章。

公元1686年，即粤海关成立第二年，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广东地方政府将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商人分开，将商行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前者主要从事国内商品的国内贸易，后者则是从事进口商品及出口商品的经营活动。“洋行”或“洋货行”，统称“十三行”，标志着十三行制度的建立。十三行制度又称行商制度、公行制度，所谓行商是指清王朝特许的经营海外贸易的垄断商人。

在清统治者眼里，工商实业、科学技术、对外贸易、海外移民一概属于危险因素而应当百般限制，致使中国生产技术、航海技术在很多关键方面不进反退。明代科学家宋应星（1587-?）所